

子禾：剥开浮皮潦草的表层，写下父辈生活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图/由受访者提供

当一位因为交通事故而瘫痪的老妇，被遗弃在肇事者家中，两个垂暮之人的生活会走向何方？作家子禾在新出版的小说《猴命》中给出了他的回答。

作为一名80后作家，子禾出生于甘肃庆阳农村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硕士班，现居广州。2019年始，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叙事文学创作，从诗歌到非虚构作品《异乡人：我在北京这十年》，再到短篇小说集《野蜂飞舞》与长篇小说《猴命》，他始终以深切的现实关怀，书写城乡缝隙中普通人的精神处境。

近日，子禾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——

新闻结束的地方，文学开始

羊城晚报：您最初是如何构思这个故事的？

子禾：《猴命》源于我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：一个老人骑电动车撞伤了一个老太太，双方家庭就赔偿责任产生了纠纷。老太太的家人为了逼迫老头负责，将老太太送到了老头家门口。后来，经过街道和村镇的调解，这家人又把老太太接了回去。看到这则新闻时，我想如果老太太真的被留在了老头家里，这两个老人将如何面对彼此？他们本就身体衰弱，丧失了劳动力，如果再增添一份沉甸甸的照料重担，他们的生活会走向何处？

当然，单单一则新闻，肯定无法推动一部小说的写作。在这本书的题词中，我写下了“献给我的父辈”，这七个字是贯穿创作始终的情感动力。我出生在甘肃东部的农村，我所熟知的父辈、祖父辈，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代，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与小说主人公甘改善极为相似——恪守责任，视道德评价为最高准则，有着超常的忍耐力，平时多是少言寡语，而在家庭生活中又常常表现得颇为粗暴。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，可到了年老时回首往事，却往往显得一事无成，显得无能，又可怜又可悲。我想写下他们的生活，剥开这种生活浮皮潦草的表层，看看这种生活的实质，看看这种生活如何影响他们。

羊城晚报：有句话叫“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的开始”，您如何理解这句话？

子禾：新闻追求客观，关注外在现象与真实发生的事件；而文学的根本是真实，但这种真实是多层次的，所以为了抵达多重真实，它必须穿透新闻所能提供的现象和事件真实，抵达更深层

的、更复杂的真实。文学追求的多层次真实，关注人物的内心感受、记忆，最终抵达情感、心灵与文化深处，如果说新闻是地表的泉水，好的文学则需要循着这地表水勘探它的地下水源。

在写作上我进行了一些看似现实主义但又超越现实主义的探索。传统的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在描写农民时，大多采用外视角，像在高处架设一台摄像机，远远地记录着人物，他们去了哪里、做了什么，但很少有人去深入、细腻地刻画这些人的内心世界。在《猴命》这本书中，我在甘改善身上投入了大量笔墨，去描写他较为细腻的感受与思量。有人批评说，一个农民会有如此细腻的思考吗？这样的批评自有其道理，毕竟在以往的作品中，以往人们关于农民（底层人）的认知中，都认为农民缺少内心活动，更缺少心理活动和思想。但我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，只要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的内心感受就一定远远大于他所能表现出来的部分。所以说长久以来，这样外视角的文学可能恰好对底层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遮蔽，似乎他们本就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。但事实未必如此。小说，恰恰可以通过虚构的方法，去探索这个可能被遮蔽的领域，将他们“无声的想法”适度地呈现出来。

是否触及真实比流派归属更重要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选择“老猴”作为全书的核心意象？

子禾：“老猴”这个说法并不是杜撰的，它来自我的童年。那时候大人常说“再不听话就让老猴抓走”。小说中，甘改善的记忆里也有类似的一幕：母亲让他给卧病在床的老祖母送饭，语带嫌弃地说：“端给那老猴。”那时他才意识到，老猴不只存在于遥远的恐惧中，它就躺

在自家炕上，虚弱得连一碗饭都端不动。于是，老猴在甘改善的脑海中分裂为两个意象：一个是能抓走小孩的神秘又凶恶有力的怪物，一个是被家人嫌弃的病弱无助的将死之人。这种分裂一直埋在他心里，直到晚年，当他面对陈秀兰事件感到无奈又恐惧时，童年的老猴再次回来了——他于是明白，老猴并不会抓走谁，但会跳到他肩上，成为他的命运。老猴不是一个实体，不用爪子和力气抓人，它用人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抓人。

人在衰老过程中，会经历生命的异化。那些附加在人身上的价值，劳动能力、家庭角色、社会尊严、爱与希望，都会随着衰老逐一剥落。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自理能力都丧失时，他便从人异化为“非人”。这个“非人”，就是老猴，它昭示着生命的残酷真相。

羊城晚报：《猴命》应该不属于现实主义写作？

子禾：20世纪以来，文学潮流繁多，人们将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写作称为“批判现实主义”，将马尔克斯的写作称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。可如果我们问过马尔克斯，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？他只是如实地描写了他观察到的南美历史，他可能并不关心他的作品归属于何种主义。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魔幻现实主义，我想，小说的最终追求都是那个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真实，既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真实，也表现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之外的那一层真实。

今天的作家们大概已不再纠结于形式与主义的选择，他们重视的是能否抵达更多、更深的真实，只要能抵达，任何形式都可以为其所用。所以很难说《猴命》到底是不是现实主义。它关心现实问题，关心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，关心人的衰老、责任和道德问题，这些都是现实问题，而在写法上，它大量使用白描。一部作品的流派归属问题不

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是否触及真实，并以自己的方式抵达了现实。

我觉得“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”

羊城晚报：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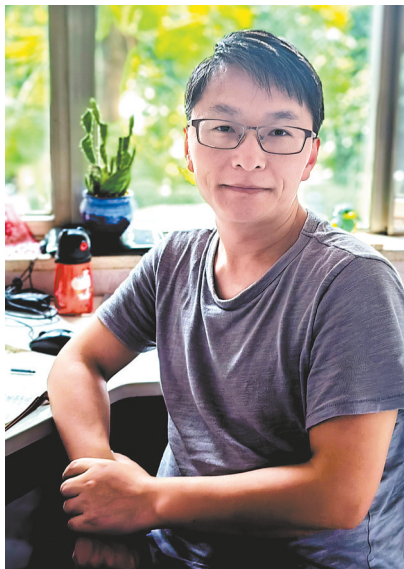
子禾：我中学时就喜欢写作，大学读中文系，在校期间发表了有限的几首诗。2008年大学毕业后，我从事了十多年图书编辑工作，始终未放弃写作，但也自娱自乐，不求发表。2019年去人大读书才真的把写作当回事，慢慢开始发作品。这几年来，发表不算少，出版了非虚构作品《异乡人：我在北京那十年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野蜂飞舞》和长篇小说《猴命》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从非虚构写作转向小说写作？

子禾：一方面，我认为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，写完《异乡人》就已经耗了我30岁之前的经验。如果再写，需大量采访、长期积累，而我缺乏那样的行动力。另一方面，我认为诗歌像一门高精尖的科学技术，虽然它不一定能大面积推广使用，但它代表着文学的前沿，那些最好的作品往往源于诗歌。但如果作家想要征战世界，小说就像坦克，它能够泥沙俱下，将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囊括进来，这是我写小说的初衷。

羊城晚报：毕业于人大作家班，导师是著名作家阎连科，您的写作是否受到他的影响？

子禾：我想我和阎老师是不同类型的作家，所以我受阎老师影响，主要不在作品层面。我敬重阎老师的文学精神。从他近十来年的创作中，我看到一种持续的、孤独的、勇敢的文学探索。“勇敢”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被用滥，大家不觉得它是了不起的品格。但放在文学中，放在具有开拓性的创造事业上，勇敢是极难达到的。



作家子禾

阎老师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正向的，他的文学追求和人格精神令我肃然起敬；另一方面又是反向的，即我清楚我们之间的不同：他的小说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叙事，所以多重视故事结构，冲突强烈，人物也多有英雄气质；但我的生命资源和生活资源都不足以支撑我写英雄，我只能写日常生活中那些最普通不过的人，他们生活庸常无趣，无缘于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，他们只是在琐碎的生活中尽力挣扎，在能维持总体平衡的状态中做出一点点微小的抗争和追求，绽放出一点人性中尚未磨灭的光点。

羊城晚报：在小说创作上，您有没有自己的榜样？

子禾：在小说创作上，这几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三位：南非作家库切，我喜欢他那种锐利的道德审视眼光；爱尔兰作家威廉·特雷弗，我着迷于他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深邃、庄严又务实的理解；智利作家波拉尼奥，他的小说有一种非常迷人的东西，一种泥沙俱下的流浪气质和包容性。

羊城晚报：接下来是否有写作计划？

子禾：我从未对自己的写作有整体规划，我的想法是一部一部写下去，尽量把每一部作品写好，让它们无愧于我的生命与努力。《猴命》是我的第三本书，这本书中所写的环境相对封闭，下一部小说我想写得更开阔、更流动，也更具有当代性——具体来说，当下几乎所有人都在被短视频和算法裹挟，我想试着写信息茧房下当代人的处境。

《当爱遇上法：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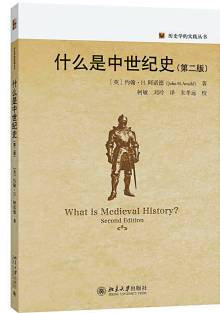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晓梅 王娅然 著



本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、继承编及相关司法解释，以“婚前—婚后—离婚—继承”四大模块为框架，通过求解亲密关系不同阶段常会遇到的115个法律问题。

《什么是中世纪史》

□约翰·H. 阿诺德[英] 著



作者以生动的案例，如针对教皇的巫术阴谋、14世纪的叛乱事件，以及贵族间的亲仇所蕴含的意义等，揭示了中世纪史学的本质，更展现了其诞生的文化政治背景。

《旧邦新造：1911—1917》

□章永乐 著



本书选择1911年革命至1917年《临时约法》被北洋政府废除这一极为动荡的时期，从极其宽广的视野出发，剖析了影响甚至决定了博弈结果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。

《数字鸿沟》

□简·梵·迪克[荷] 著



本书考察了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数字不平等的状况，总结了数字鸿沟的不同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，创立资源和占有理论模型，系统揭示数字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及运行机制。

《长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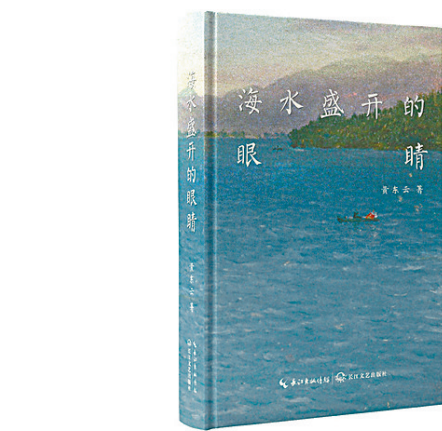
□朱鸿 著



本书以长安为核心，系统梳理其山川形胜、历史渊源与千年变迁，更专设章节讲述与长安休戚与共的英雄人物故事，字里行间带着深沉的历史思考。

锐评 谢有顺：遇见卑微、沉默的人

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命运，而子禾选择关注农村留守老人这一被社会遗忘的群体——他们不仅被忽视，连内心世界也无人问津。小说中的甘改善、陈秀兰等老人，普遍被嫌弃，连子女都嫌弃他们。大多数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：话少。个别唠叨的，那其实是另一种层面——因为说的是废话，没人听，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声。当他们发现没有有效的对话者，便不再开口。子禾要为这些无声者发声——他们也曾年轻、呼喊、拥有响亮的人生。如果无人关心，他们将永远沉默。



感悟 不刻意作诗方成诗

□张海鸥

比如一位拿了大奖的著名诗人朗诵他的诗，大意是：我的邻居就住在我隔壁，隔壁的墙很薄，隔不住声音。邻居放个屁我听得见，邻居炒菜我听得见，邻居吵架我听得见，邻居看电视我听得见……后来我把墙加厚了一倍仍然听得见……

内行人说这是叙事风格，是当前诗坛的流行。我们一行人都欣赏不了，就提前退场了。事后反复品味，总觉得那些过于标新立异的诗缺乏诗意和美感。

黄东云的诗绝非此类。他的诗很纯净，富于诗意的美感。他不刻意

作诗，而是把自己内心的真情感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。当然，他表达得美丽而动人。比如《钻石》，诗人用钻石般的心灵和钻石般的语言，诉说着人类美丽的期待：“最明亮的那颗星/总会在夜色最浓时升起/将黑暗驱散”。有人说诗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，就是能永葆童心。黄东云的诗中，就一直跳动着一颗纯净的童心。比如他笔下的月光：“这乳白色的恩泽有多深广/静静流淌/不被黑夜污染/对谁都晶莹剔透”。在这个“污染”日益严重的世界里，诗人显得过于天真，对什么都满怀理想的期待。但唯

其如此，才难能可贵。作诗需要有性情，也必须有思想，没有思想不可能写出好诗。黄东云喜欢思索，也善于思索。旅行归来，他“回到家里，家具们或站或坐，在客厅原来的位置，原来的姿态。但我知道，我不是回到旅游的起点”。人在旅途，路总是要走的。在诗人眼里，每条路都是“向上伸长的志愿”。路与志愿对每一位行者都是缘分，然而“再长的缘分，回首之时也就是这春夜的一梦”。用诗写自己切实的生活体会，自然流畅，一点也不矫情，哲人们说“诗意地栖居”，黄东云正可当之。